



苗族同胞在祭鼓节活动中跳起欢快的苗族芦笙舞



苗族祭鼓舞

苗族古歌《簪汪传》走出深山

——记者探访其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

今年6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清镇市申报的苗族古歌《簪汪传》成功入选扩展项目名录。

《簪汪传》是一部过去不曾进入学者视野的苗族史诗,其内容丰富,涵盖人类起源、开天辟地、生产生活和战争迁徙等内容,是四印苗关于族群来历的心史记忆,对于研究四印苗的民族史、迁徙史、战争史具有重要价值。

从2010年开始搜集、翻译、整理,到渐渐被更多人知晓,苗族古歌《簪汪传》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这期间,余未人、杨照飞等一批专家学者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省非遗处、贵阳市非遗中心、清镇市委市政府等对发掘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民间歌师以及清镇市文旅局、清镇市非遗中心、有关乡镇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让《簪汪传》走到台前,让世人知晓。



一次看似偶然的相遇

千山万壑的贵州,很多传统民间文化得以完整的保护,苗族古歌《簪汪传》就是深藏在贵州大山之中的民间文化瑰宝。苗族古歌《簪汪传》此前一直在四印苗民间口耳相传,养在深闺人未识。

“苗族古歌《簪汪传》的发现,源于一次偶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文史馆馆员余未人回忆道,2010年初夏,她和几位热衷于非遗的朋友到清镇市麦格乡观赏新辟的一处文化景点,时日尚早,大伙决定去周边苗寨走走,凑巧走到龙窝村猫寨的一个苗族歌师家。

当时,余未人正在参与紫云县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的编审工作,思绪常沉湎其中。她与歌师聊到苗族古歌,得知这里的苗族古歌和《亚鲁王》有很大不同,她意识到这里又是一处民间文学的富矿。

让余未人兴奋不已的这一苗族古歌,就是由四印苗民众代代口耳相传、唱诵英雄先祖簪汪征战迁徙的史诗——《簪汪传》。随后,在她的推动下,经过充分的田野调查和研究,省、市非遗有关部门决定对其进行立项搜集和保护。余未人邀请著名民间文学专家刘锡诚去猫寨考察,刘锡诚对四印苗的这一宝贵遗产非常看好,并在《文艺报》撰文《走马苗寨》对此非遗项目给予了肯定。

翻译整理过程历经艰辛

苗族古歌《簪汪传》由“宝冒”(掌坛师)、“无绕”(歌师)用西部苗语四印苗支系土语在十二年一次的祭鼓节完整唱诵。由于唱诵采用的是四印苗土语,还夹有不少古苗语,而且四印苗歌师汉语表述能力有限,又很难找到精通四印苗土语的专门人才,《簪汪传》的翻译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后来,由清镇市和有四印苗聚居的修文县皮家寨选派几位四印苗村民,去紫云自治县“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学习西部苗语的拼音注音,但去学习的人员学会了拼音、记音,却很难用汉文书写,不会翻译,最后没能成功。

直到2016年,贵州大学教授张晓推荐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译审专家杨照飞翻译古歌,母语是苗语川滇黔方言(西部方言)的杨照飞欣然接受,从昆明来到清镇,住到了龙滩寨四印苗歌师家中,日以继夜学习四印苗语言,学会后将清镇市非遗中心拍摄的音像资料带回去翻译。为了补充唱诵记录,杨照飞又多次前往龙滩、大谷佐等地做田野调查,还把四印苗的歌师请到昆明去。

“民间文化发掘的周期长,有时一个项目就要做很多年,短期内又不会产生经济效益,所以坚持做民间文化保护以及非遗的专家学者靠的都是对民间文化的浓厚兴趣和

人文情怀。”余未人说,经过一些像杨照飞这样的优秀同行的共同努力,翻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历时两年多,杨照飞终于将四印苗的唱诵记录翻译出来,又经过余未人等人的整理,几经修订和补充,2019年,苗汉文对照的《簪汪传》内部版出版,让项目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民间文学宝库的珍品

歌师们唱诵的《簪汪传》听起来似乎简单,实际上是长篇巨制,是一部长达8000行的神话英雄史诗,有主要人物33个,次要人物数十人。史诗想象力丰富宏远,主要人物性格鲜明丰满,情节起伏跌宕,细节生动。

该书讲述了生长在天朝的簪汪,自幼在父亲蝶瑟蟒身边修炼获得法力,长大后,蝶瑟蟒送他下凡历练。簪汪率众开疆拓土并养育九男五女。之后簪汪获得了最珍贵的宝物龙心,在省聊称王建京城,长子汪代也担当重任。簪汪原本与世无争,却屡遭黄龙、红龙率部侵犯。为夺回地盘,簪汪与他们大战三次夺回领地后,便不再恋战,归隐田园做凡人。后来,簪汪之女受骗,痛失宝物龙心。黄龙又对汪代发起战争,簪汪只得率九子及其部众撤离省聊,艰难迁徙,最后到清镇、修文等地落脚。

《簪汪传》是四印苗关于民族

本源的史诗,也是研究四印苗民族史、迁徙史、战争史的重要资料,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强烈的民俗性,除在祭鼓节上完整唱诵外,在四印苗婚丧嫁娶、建房时也有部分唱诵。可以说,史诗参与了四印苗人每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在四印苗心中,簪汪关乎本民族的祖源,唱诵簪汪古歌的习俗深入人心。《簪汪传》还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簪汪带领族人一路迁徙到清镇,文中142个地名详实可考,是迄今所知的苗族古歌、史诗中,唱诵迁徙路线、地点最详尽、最清晰明确的作品。同时,还具有独特的音乐性,其节奏简洁,旋律单纯,沉郁而悲壮。

经普查,清镇市现在能够较完整唱诵《簪汪传》的歌师有31名。为让其得到更好的传承,除开数字技术等方面的保护外,清镇市还建立了簪汪古歌传习所,定期开展传习活动,举办四印苗古歌歌唱比赛,邀请专家研究发掘其内涵和价值。

“苗族古歌《簪汪传》申遗成功,意味着清镇、贵阳乃至贵州对外宣传又添了一张文化名片。下一步,我们计划制作苗族史诗《簪汪传》动画片;以簪汪为形象,推出系列文创产品;联合清镇境内的恐龙小镇歌舞剧院,打造与簪汪有关的主题歌舞作品,让四印苗文化走上更宽广的舞台。”清镇市文体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中国医生》票房超9亿元领跑暑期档

袁泉:这是一次特别的演出

反映武汉抗疫题材的电影《中国医生》正在热映,目前票房已突破9亿,上座率、口碑均领跑整个暑期档。演员袁泉在影片中扮演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文婷,她的原型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接受记者采访时袁泉说:“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演出,在我演员生涯中最吃不准的一次。”

2019年,袁泉跟张涵予在刘伟强导演的《中国机长》中分别饰演乘务长毕男和机长刘长健。此次听到《中国医生》要开拍的消息,袁泉主动请战,在她看来,“这是不可能拒绝的一部电影,它的价值超出了电影本身。”

作为一名医生,文婷在片中有大量做手术的镜头。影片开拍前,剧组专门请来医护人员跟剧组人员吃住同住148天,给演员们做培训,解

答医学上的疑问和技术上的难点。袁泉发现,他们的身上都有有一种特别坚定的力量,乐观、质朴。

除了技术,袁泉还会向医生们请教,“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坚持下来?在手术当中出现了问题,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怎样去寻求帮助,最后把这个手术圆满完成?”在她看来,当医生需要有很强的心理支持和自我修养。

以往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往往给观众一种一切尽在医生掌控的感觉。这次拍摄《中国医生》,袁泉完全没有这种掌控感,她甚至很多次都有种恍惚的感觉。“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它不可控。拍摄的整个过程中,会觉得这些医生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那种帅是一种非常职业感的呈现。我在整部戏里都试图去靠近,但这太难了。”袁泉记得,几乎每天开拍前,要

先穿好防护服,中间休息的时候也不能脱,“换了衣服,人一下就舒服了,舒服下来的感觉可能就不对了,所以不能脱。”最长的一次,袁泉整整穿了8个小时防护服,而她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她说:“穿上防护服拍戏,内心的感受真的不一样,就像是披着战袍去打仗的状态。”

有一天拍摄前,袁泉觉得自己一条腿的韧带有点疼,但拍摄一开始,就感觉不到了,等到上午拍完休息了一个小时后,这种疼痛感又回来了。“我在想,医生们也一样的,他们做手术时,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就是奋不顾身的感觉。”

在拍了《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后,她对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充满了敬畏,“会觉得每个职业都很神圣,这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特别难得的经历。”



《中国医生》中袁泉的扮相

个优势,但她自己反而要更多地控制住情绪,“医生这个职业,是不允许有太多个人情绪流露的。”至于如何才能不让情绪泛滥,答案是:别慌,“拍这个戏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沉住气,不慌,但不慌是不太可能的。”

虽然演员们都拼尽全力,但袁泉也承认,要想还原医生们的真实状态,不可能。“只能尽全力去接近。作为医务人员,需要具备的一些心理素质,是常人没有的。这可能也是我在整个电影拍摄当中一直想要去体会,又觉得差得很远的地方。我想,文婷这个角色就是在疫情当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全力,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拍完《中国医生》,袁泉对医生的尊敬又多了几分,“千言万语一句话,他们真的太伟大了!”

王金跃